

## ■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 试论北齐北周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努力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北齐、北周两个东西对峙的北朝王朝,分别致力于以邺城和长安为中心的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军事任务浩繁,除战时屯田经济较有成效外,其区域整合绩效有限。这在两朝货币秩序的混乱中得到集中体现。

[关键词] 北齐(含东魏);北周(含西魏);国家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2)02-0098-05 [收稿日期]2011-10-18

[作者简介]王明前,男,江苏苏州人,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史学界对北齐(含东魏)北周(含西魏)二朝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目前,北齐北周经济史一般被置于北朝经济史的总体框架内叙述,且作为北魏经济史的自然延伸被提及,因此二朝经济的独立价值尚未得到有针对性的重视。笔者注意到,国家经济一体化<sup>①</sup>能够反映一个王朝对疆域内各经济区域的空间布局和宏观构思,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国家经济一体化角度对北齐北周经济史做简要梳理,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北朝经济史的学术认知。<sup>②</sup>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从洛阳西迁长安,投奔关中的宇文泰,试图摆脱坐镇晋阳的权臣高欢的控制。高欢和宇文泰得以先后控制各自的魏室傀儡,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西魏,进而分别于550年和557年禅让于北齐和北周,北方历史进入东西对峙期,直到581年北齐被北周攻灭才重新统一。北齐、北周虽然分割了原北魏的疆土,且继承了北魏的基本经济制度如均田制等,应被视为是北魏王朝的继承者,但是仍然在国家经济一体化上体现出自身个性。

### 一、北齐以邺城为中心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努力

#### (一)邺城中心经济区的营造

北齐选择邺城作为新经济重心,是由于北魏迁都洛阳后形成的河南中心经济区,在六镇起义后的社会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东西魏分裂后,洛阳地区成为东魏军事斗争的前沿,已无法发挥原经济中心的功能。而地理位置介于河北、河南、河东和山东之间的邺城,则可以实现对东魏、北齐上述各经济区

域的整合。

因此,由于“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河南经济区凋敝残破的现实,迫使高欢作出“天平元年,迁都于邺”的决策,并通过“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振贫人”的保障措施,使迁都得以实现。迁都伊始,邺城地区的经济基础尚很薄弱,但高欢仍然采取优厚的补贴政策。史言“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并给常廩春秋二时赐帛,以供衣服之费”。而为弥补由此带来的庞大财政支出,高欢主持的东魏政权不得不于“常调之外,逐丰稔之处,折捐绢余粟,以充国储。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贍”。经过高欢的悉心经营,东魏出现“仓廩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sup>[1]</sup>的繁荣景象。

但是,东魏迁都邺城之初,经济秩序十分混乱,如“当时迁都邺,阳平即是畿郡,军国责办,赋敛无准,又勋贵属请,朝夕征求”。好在经过阳平太守许惇“御之以道,上下无怨,治为天下第一”<sup>[2]</sup>,才终于稍可自立。同时,东魏还大力兴修水利,为邺城中心经济区奠定经济基础。如高隆之任营构大将,主持邺城营造,“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滥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硖,并有利于时”<sup>[3]</sup>。541年,东魏“发夫五万筑漳淀堰,三十五日罢”<sup>[4]</sup>。

此外,北齐在对邺城中心经济区的经营过程中,

有意识强化对鲜卑贵族统治集团经济利益的维护。史言“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贲以上,各有差”<sup>[5]</sup>。但是,北魏宗室的经济地位已经有所下降。如魏宗室元文遥,“自洛迁邺,惟有地十顷,家贫,所资衣食而已”<sup>[6]</sup>。

遗憾的是,高欢时代的繁荣局面很快瓦解。“及文襄嗣业,侯景背叛,困于兵革”,使东魏疲于应付。之后虽有“侯景乱梁,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的收获,但是“其新附州郡,羁縻轻税而已”<sup>[7]</sup>,根本无补于侯景之乱造成的损失。

## (二) 北齐对其他经济区域的开发

北齐在对邺城中心经济区刻意营造的同时,对其他经济区域也不失必要关注。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550)六月甫即位即宣布“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复田租。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sup>[8]</sup>。

北齐既然以邺城为经济中心,自然致力于对华北地区的经营。而这之中,又以河北为重点。幽州不仅为河北重要经济区,且由于地处北部边境要地,尤其得到北齐的重视。历任刺史均勤于兴修水利。如斛律羨任幽州刺史时,“导高粱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溉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sup>[9]</sup>。尉长命东魏时任幽州刺史。“州居北垂,土荒民散”,长命“以恩抚民,少得安集”<sup>[10]</sup>。卢文伟任幽州平北府长统参军期间,“说刺史裴隽按旧迹修督亢陂,溉田万余顷,民赖其利”<sup>[11]</sup>。但是,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北齐“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以处之”,本是一项调整地区资源配置不均的政策,却不知因何故而引起“百姓惊扰”<sup>[12]</sup>,十分遗憾。幽州以北的平州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如孝昭帝建和年间,平州刺史嵇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sup>[13]</sup>。

其他华北地区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经营。如天保二年(551),高睿任定州刺史,“留心庶事,纠摘奸非,劝课农桑,接礼民俊,所部大治,称为良牧”<sup>[14]</sup>。天保八年(557)又迁北朔州刺史,“慰抚新迁,量置烽燧,内防外御,备有条法,大为兵民所安”<sup>[15]</sup>。对经济地位下降的河南,北齐则“于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sup>[16]</sup>。

北齐虽然占据原属南朝的淮北、淮南之地,却始终无法使之纳入国家经济一体化中,以至于出现“齐政烦赋重,江北之民不乐属齐,其豪杰数请兵于王僧辩”<sup>[17]</sup>的局面。由于淮南原为南朝疆土,始终处于军事斗争前沿,因此源彪建议采取羁縻策略,所谓“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如文宗计者,不过专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兼领旧将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于昙顼,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窃谓计之上者。若不推赤心于琳,别遣余人掣肘,复成速祸,弥不可为”<sup>[18]</sup>。其实,身体力行者不乏其人。如元景安于大宁、武平年间历任徐州、豫州刺史,“在边州,邻接他境,绥和边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sup>[19]</sup>。

源彪的建议尚处于政治策略层面,而在经济政策方面,北齐由于面临严峻的军事斗争环境,在北方柔然、西方西魏北周以及南朝的压力下,只有选择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屯田制度,才能够尽可能有效地稳定经济基础。史言“属以频岁不熟,米余踊贵矣。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廩充足”<sup>[20]</sup>。这方面,水利设施的建设为地方官吏施政的重点。如杜弼于文宣帝时行海州事,“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sup>[21]</sup>,改良灌溉环境。

北齐西境以防备北周为要务,自然以军事屯田为必然选择。卢叔武上书肃宗,建议“宜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若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损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一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有艰难,与我相持,农作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sup>[22]</sup>。

## (三) 长城的修筑—北齐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外部屏障

北齐自高欢开国即致力于北境长城的修筑,历代君主力役不辍,尤以文宣帝高洋时代工程最为浩繁。

东魏元象元年(538)十月,高欢“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履,莫不严密”<sup>[23]</sup>。北齐天保三年(552)十月,文宣帝“至黄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sup>[24]</sup>。天保五年(554)十二月,文宣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sup>[25]</sup>。天保六年(555),赵郡王高睿又“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sup>[26]</sup>。这次工程“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

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sup>[27]</sup>。

至天保七年(556)十二月,北齐长城已筑成“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sup>[28]</sup>。天保八年(557)又“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戍,凡四百余里”<sup>[29]</sup>。

在高洋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基础上,河清三年(564)武成帝“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西,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sup>[30]</sup>。后主天统元年(565)幽州刺史斛律羨,“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长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sup>[31]</sup>。

北齐长城在成功抵御柔然侵扰的同时,也为国家经济一体化构筑起有效的外部屏障。

## 二、北周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努力

北周王朝建立者文帝宇文泰攫取西魏权柄后,悉心致力于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经过三代帝王的不懈经营,终于使北魏时代属于落后地区的关中,成为西魏、北周得以立国的经济重心,并成为向东向南扩张的战略基地。

宇文泰治国从立法开始。西魏大统元年(535)三月,宇文泰“以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sup>[32]</sup>。大统七年(541)十一月,宇文泰“奏行十二条制,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又下令申明之”<sup>[33]</sup>。大统十年(544)七月,“魏帝以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sup>[34]</sup>。至魏恭帝元年(554),宇文泰假借恢复北魏初期部族制,“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以复古旗号为掩护整合社会资源。魏恭帝三年(556)正月,确立复古周礼的官制,“初行周礼,建六官”<sup>[35]</sup>。

为强调关中的国家政治中心地位,北周政权刻意抬高关中的政治地位。明帝宇文毓二年(558)三月诏令“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sup>[36]</sup>。北周统治集团除关陇集团外,亦有部分随魏孝武帝西迁而来的原居住在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明帝此诏旨在混同两部分贵族群体的同时,明确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以求得凝聚统治集团向心力的政治效果。

西魏、北周对关中中心经济区的的经营取得了显

著成就,而这一切得力于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对农业的重视。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正月,“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sup>[37]</sup>。薛善任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善为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善自督课,兼加慰抚,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sup>[38]</sup>。王思政于西魏大统八年(542)任并州刺史,“镇弘农。于是修城郭,起楼橹,营田农,积刍秣,凡可以守御者,皆具焉”<sup>[39]</sup>。

以关中的经济发展为契机,西魏、北周其他区域的经济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取得一定成就。其中,靠近关中的西北地区,由于远离军事斗争前沿,成就尤其显著。西魏时期,独孤信任秦州刺史,“事无雍滞。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人愿附者数万家”<sup>[40]</sup>。北魏永安二年(529)寇俊任凉州刺史,“命郡县立庠序,劝其耕桑,敦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sup>[41]</sup>。韩褒于西魏大统十二年(546)任西凉州刺史,“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sup>[42]</sup>。西魏废帝元年(552)窦炽任陇右的原州刺史,“抑挫豪右,申理幽滞,在州十载,甚有政绩”<sup>[43]</sup>。

在有效经营关中和西北地区的基础上,西魏、北周对东部临北齐边境和南部临南朝边境的开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西魏时,“河东初复,民情未安”。李远任河东郡守,“敦奖风俗,劝课农桑,肃遏奸非,兼修守御之备。曾未期月,百姓怀之”<sup>[44]</sup>。西魏、北周兴起之时,正值南朝梁陈朝代更迭和遭受侯景之乱,因此对荆州的开发,以招抚流离,实现有效统治为急务。西魏大统十四年(548),贺兰祥任荆州刺史,“颇有惠政”,以致“汉南流民,襁负而至者日有千数。远近蛮夷,莫不款附。祥随机抚纳,咸得其欢心”<sup>[47]</sup>。长孙俭任荆州刺史,“务广耕桑,兼习武事,故得边境无虞,民安其业”<sup>[46]</sup>。孝闵帝时期,郭彦任原属南朝的澧州刺史。澧州“蛮生梗,未遵朝宪。至于赋税,违命者多。聚散无恒,不营农业。彦劝以耕稼,禁共游猎,民皆务本,家有余粮。亡命之徒,咸从赋役。先是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自彦莅职,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sup>[47]</sup>。

北周还趁南朝王朝更替之机,意外攫取蜀地。为实现对益州的有效统治,北周施政以抚绥为急务。达奚实受命行南岐州刺史事。“先是,山氏生犷,不供赋役,历民羸靡,莫能制御。实导之以政,氏人感悦,并从赋役。于是大军粮食,咸取给焉”<sup>[48]</sup>。辛昂于保定

年间受命“使于梁益,军民之务,皆委决焉”。辛昂“抚导荒梗,安置城镇,数年之中,颇得宁静”<sup>[49]</sup>。

洛阳长期处于北齐、北周军事斗争的前沿,因此难以实现北魏孝文帝迁都时期期待的国家经济中心职能。直到北周灭亡北齐重新统一北方后,洛阳的经济中心地位才得以恢复。579年,周宣帝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发山东诸州兵治洛阳宫,常役四万人,徙相州六府于洛阳”<sup>[50]</sup>。

北周和北齐一样,也十分重视构筑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外部屏障。早在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533),贺拔岳即“岳自诣北境,安置边防。率众趣平凉西界,布营数十里,托以牧马于原州,为自安之计”<sup>[51]</sup>。宣帝大象初,大司徒于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之后任幽州总管,“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sup>[52]</sup>。特别是北周灭亡北齐后,继续其修筑长城的政策。宣帝大象元年(579)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sup>[53]</sup>。这些都为北周国家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力的外部保障。

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对北齐、北周国家经济一体化的促进

#### (一) 北齐

北齐、北周对国家经济的宏观管理,表现为在劝农的主旨下,对国家土地和人口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以及货币和度量衡工具的使用。

东魏北齐当局倡导劝农,要求地方官吏恪尽劝农职责,“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蚕桑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人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焉”<sup>[54]</sup>。东魏北齐甚至把屯田作为官吏考绩的一项指标,“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sup>[55]</sup>。

北齐和北周均沿袭北魏的均田制。但是,前文已述,由于北齐在立国之初,为获得鲜卑贵族对迁都邺城的支持,曾经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优遇鲜卑贵族的策略。但是,为求得长治久安,北齐统治集团虽然优遇鲜卑贵族,也力求民族和解。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sup>[56]</sup>。为此,东魏、北齐均大力平均土地资源。如

高隆之任尚书右仆射,“时初给民田,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隆之启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sup>[57]</sup>。特别是,为实现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均田制和受田的推行均要求北齐国家保有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如“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孤枝侵窃官田,受纳贿赂”<sup>[58]</sup>,被冯翊王高润查办。

北齐还厉行扩户,尽力掌握人口资源。高欢“行经冀州,总和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户口增损”<sup>[59]</sup>。面对北魏末年形成的“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的局面,高欢“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是后租调之入有加焉”<sup>[60]</sup>。

东魏、北齐货币流通秩序混乱。统治者虽做出很大努力,也终究难以扭转颓势。东魏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但辖境内币制混乱,亟待整饬。“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绢布”。高欢对此略加整饬,“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在并未禁私铸革劣币的前提下,只适当增加货币成色信用俱佳的永安五铢的投放量,自然无法扭转“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的颓势<sup>[61]</sup>。

继任者高澄对币制混乱的局面无可奈何,准备默认私铸泛滥的既成事实,只在成色环节上加以规范。史言“澄患民钱滥恶,议不禁民私铸,但悬称市门,钱不重五铢,毋得入市。朝议以为年谷不登,请俟它年,乃止”<sup>[62]</sup>。

直到北齐立国,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正月,“改铸新钱,文曰长平五铢”<sup>[63]</sup>。虽然这次铸造的新币成色甚佳,“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可是仍未能改变币制混乱的局面。不仅“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而且“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sup>[64]</sup>。这是北齐各经济区域整合尚缺乏一体性的显著表现。特别是东魏北齐私铸现象严重,如东魏官员王则于元象初年任洛州刺史期间,“取受非法,旧京取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sup>[65]</sup>,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

此外,高欢于东魏天平二年(535)九月,“请均斗尺,班于天下”<sup>[66]</sup>,试图确立东魏辖境内的度量衡标准。

#### (二) 北周

北周统治集团也力促劝农。文帝宇文泰重用苏

綽,“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實質不脫勸農主旨,鼓吹“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經紡績,起于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經,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希望達到“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sup>[67]</sup>的理想社會效果。

北周武帝志在滅北齊,于建德四年(575)下詔勸農“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sup>[68]</sup>。韋孝寬上書建議屯田解決軍需“三鴉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勇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sup>[71]</sup>。滅北齊后,武帝于建德六年(577)十一月詔令釋放奴婢:“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沒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所留為部曲及客女”。同時,通過嚴刑峻法打擊隱匿戶口行為,于《刑書要制》中規定“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至死”<sup>[70]</sup>。

西魏、北周自文帝開國直到武帝即位,貨幣流通秩序始終混亂。“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直到武帝保定元年(561)七月,始“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并行”<sup>[73]</sup>。建德三年(574)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并行”<sup>[72]</sup>,試圖“大收商估之利”<sup>[75]</sup>。但此舉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而且使幣制更加混亂。所謂“大收商估之利”,無非是通過片面增加貨幣投放量,掠奪百姓財富。建德四年(575)七月,北周當局即宣布“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听入而不听出”,試圖強制推行不足額的五行大布錢。建德五年更假“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的名義而“遂廢之”,并嚴令禁止私鑄,“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以更殘酷的手段推行大布錢。宣大象元年(579)十一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并用”,進一步強化用通貨膨脹掠奪民間財富的貨幣政策。只是這一政策并未推行到原北齊境內。“齊平已后,山東之人,

猶雜用齊氏舊錢”<sup>[74]</sup>。與北齊相比,北周的貨幣混亂狀況雖然稍好些,但是北周貫徹擴張的貨幣政策則更徹底更堅決。此外,建德六年(577)八月,武帝詔令“議定權衡度量,頒于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sup>[75]</sup>,以規範北方重新統一后的度量衡標準。

綜上所述,北齊、北周兩個東西對峙的北朝王朝,分別致力於以邺城和長安為中心的國家經濟一體化進程。由于軍事任務浩繁,除戰時屯田經濟較有成效外,其區域整合績效有限。這在兩朝貨幣秩序的混亂中得到集中體現。

注 釋

①理論上講,在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前的前資本主義時代,東方亞細亞社會由于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加之受制于交通和地理因素,不可能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但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無論是統一的王朝,還是疆土遼闊囊括多經濟地理單元的王朝,在實現政治大一統的同時,无不致力於國家各經濟區域的整合,以鞏固政治統一的成果。如秦始皇修靈渠以開發嶺南,隋煬帝修大運河以溝通南北交通等等,都是統一王朝致力國家經濟整合的時代壯舉。同時由于中國古代經濟以農耕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特點,要求王朝統治者必須為該王朝的經濟統一體構築外圍屏障,防止草原游牧民族的擄掠。如從秦始皇開始歷代之修筑長城。筆者將這一行政努力命名為國家經濟一體化,或經濟區域整合。

②相關研究可參見毛漢光關於中古中心經濟區的論述,載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另參見:李紅艷《十六國北朝時期草原文化與山東文化的沖突與合和》,載殷亮、馬志強主編《北朝研究》第二輯,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228-246頁;〔日〕西嶋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84年;高敏《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韓國磐《南北朝經濟史略》,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蔣福亞《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陳守實《中國古代土地關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

參考文獻

[1][5][7][12][13][16][20][54][55][60][61][64][71][73][74][唐]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675-676,677,676,676,677,677,676-677,678,678,676,690-691,690-691,691,696,691.  
[2][3][6][8][9][10][11][14][15][18][19][21][22][23][24][25][26][28][29][31][57][58][59][63][65][66][唐]李百藥.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574,236,504,51-52,227,249,319,171,171,578,543,353,559,22,56,57,171,63,64,227,236,139,571,57,272,19.  
[4][17][27][30][50][56][62][宋]司馬光.資治通鑑[M].北京:中華書局,1958:4908,5901,5130,5231-5232,5394,4882,4999.  
[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1][52][53][67][68][69][70][72][75][唐]令狐德棻.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1,27,28,36,55,66,624,295,266,658,661,519,420,36,428,667,503,699,224,526,120,382,91,540,104,85,77.

(責任編輯:賀永泉)